

浙江

模式

向何处去

The outlook of Zhejiang way

卓勇良◎著

浙江模式缘起于摆脱贫穷，浙江富裕之后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农业文明支撑，浙江精神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基层和民间创业，浙江资本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体制突破，浙江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

模式

向何处去

The outlook of Zhejiang way

卓勇良◎著

浙江模式缘起于摆脱贫穷，浙江富裕之后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农业文明支撑，浙江精神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基层和民间创业，浙江资本向何处去？浙江模式缘起于体制突破，浙江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模式向何处去 / 卓勇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61 - 0826 - 0

I. ①浙… II. ①卓…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 - 浙江省 IV. ①D67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34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总论 浙江模式向何处去	(1)
一、必须高度关注浙江增长位次下滑问题	(1)
二、浙江模式的式微	(2)
三、浙江精神的式微	(6)
四、浙江中小企业的式微	(9)
五、浙江中小企业成长性弱化的深入观察	(12)
六、四问浙江模式	(14)
第一章 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	(18)
一、劳资分配关系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18)
二、劳动收入增长较快但低于 GDP 增长	(20)
三、劳动所得占 GDP 比重大幅下降	(25)
四、资本所得占 GDP 比重大幅上升	(29)
五、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决定了消费与投资比例	(32)
六、理性看待劳动所得比重过低与资本所得比重过高问题	(36)
七、简要建议	(40)
第二章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是当前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主要 根源	(42)
一、劳动所得比重过低原因的深入分析	(42)
二、劳动所得比重较低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不利影响	(47)
三、充分认识劳动所得比重上升的难度	(50)
第三章 深入认识当前浙江经济的“相对性”问题	(53)
一、增长速度位次持续下滑	(53)
二、浙江当前较难适应全国经济增长格局	(56)

三、相对性问题反映了浙江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62)
四、相对性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65)
第四章 浙江经济持续回落与着力结构创新的建议	(68)
一、浙江工业持续深度回落	(68)
二、分析之一：宏观环境不利于浙江经济	(69)
三、分析之二：路径依赖	(71)
四、分析之三：投资持续不足	(75)
五、当前浙江经济的两个趋势	(77)
六、着力结构创新的战略转变	(83)
第五章 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分析	(85)
一、浙江投资困境及其相对低增长趋势	(85)
二、国内进入投资优化的新阶段	(91)
三、投资格局变化对于浙江经济优化升级总体有利	(96)
四、努力保持浙江“十二五”投资适度较快增长	(98)
第六章 浙江上市公司对省外投资研究	(101)
一、对省外投资快速增长	(101)
二、区域分布以沿海为主，向中西部转移趋势增强	(106)
三、产业以制造业为主，新兴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109)
四、投资动因及行为特征	(113)
五、省外投资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与今后趋势	(119)
六、积极引导和稳步推进对省外投资	(121)
第七章 省情两重性与浙江发展的曲折	(125)
一、浙江基本省情的两重性	(125)
二、基本省情决定了浙江能较快后来居上也能较快落伍的 特点	(129)
三、基本省情决定了当代浙江最大优势是富有活力的 浙江人	(131)
四、省情两重性决定了当代浙江精神及浙江人的局限	(132)
五、确立励精图治重铸优势的坚定信念	(134)
第八章 深化改革是当前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	(137)
一、草根式改革的历史局限	(137)

二、发展改革再次到了重大转折关头	(139)
三、积极实施三大基本转型	(141)
第九章 浙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146)
一、社会管理体制及其改革背景	(146)
二、“十一五”改革的主要进展	(148)
三、“十二五”改革面临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153)
四、“十二五”指导思想和原则	(157)
五、“十二五”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158)
六、“十二五”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保障措施	(163)
第十章 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及特点的历史分析	(165)
一、解放思想是渐进式改革的关键环节	(165)
二、姓“资”姓“社”成为解放思想的焦点	(166)
三、浙江解放思想的一条主线是突破姓资姓社束缚	(168)
四、浙江解放思想由紧跟中央到创造性发展的变化	(169)
五、基层解放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	(172)
六、当前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175)
第十一章 长三角当前问题及实行特殊政策的若干建议	(177)
一、引言	(177)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178)
三、长三角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81)
四、对长三角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的若干建议	(188)
第十二章 减税及优化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	(191)
一、长三角退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方阵	(191)
二、长三角税负高于全国平均	(192)
三、高税负不利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	(194)
四、高上缴率进一步影响区域发展和转型	(197)
五、大国的中央财政比重应低于小国	(203)
六、强化市场机制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205)
第十三章 从土地征用看当前深层次体制矛盾	(207)
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理困境	(207)
二、法律不适应各地实际的法治困境	(210)

三、产权激励约束弱化的效率困境	(212)
四、简短结语：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当务之急	(213)
第十四章 关于完善耕地红线政策的分析和建议	(215)
一、当前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用地需求较大的必然性	(215)
二、现有耕地尚有较大的粮食增产潜力	(220)
三、耕地后备资源和国际贸易具有较大潜力	(224)
四、关于浙江建设用地合理性的简略分析	(227)
五、政策建议	(231)
第十五章 关于实行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的建议	(233)
一、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具有较好绩效	(233)
二、终结发达地区的县（市）概念	(234)
三、实行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235)
四、有利于市和县（市）双赢的实施原则与建议	(236)
五、这一改革具有纲举目张性质的积极意义	(238)
第十六章 日本对外投资格局与浙江对策	(240)
一、快速增长的日本对外投资	(240)
二、以美国为主体的对外投资地区格局	(244)
三、以非制造业为主体的对外投资产业格局	(248)
四、日资海外企业的经济活动模式	(251)
五、对外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与今后趋向	(256)
六、若干建议	(258)
第十七章 日本经济格局与结构变动及其对浙江的启示	(263)
一、日本经济格局与浙江具有显著不同	(263)
二、时间与发展进程的产业结构变动差异	(266)
三、日本制造业结构变动及与浙江比较	(270)
四、日本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及与浙江比较	(274)
五、若干启示	(279)
后记	(283)

总 论

浙江模式向何处去

浙江经济正处于持续的相对低增长之中。2001 年以来，浙江经济就自身而言仍增长较快，但增长速度在全国的位次持续下降。改革开放前 30 年，浙江经济增速为全国第二；30 年过去之后的头三年，即 2008—2010 年，浙江经济增速连续为全国倒数第五，2011 年上半年为全国倒数第三。就在笔者校对本书的时候，又听到了 2012 年 1—2 月份，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比上年同期增长 2.9%，比全国平均低 8.5 个百分点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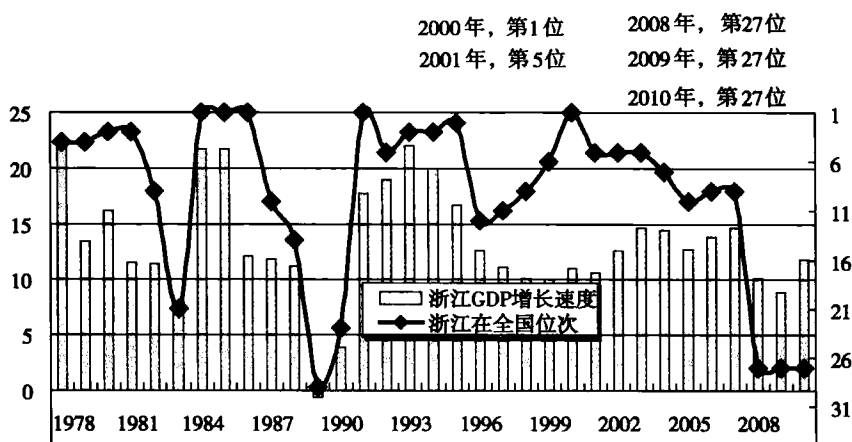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10 年浙江 GDP 增速及其在全国的位次

一、必须高度关注浙江增长位次下滑问题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就特定角度分析，可以说是一个分配现象。正是由于劳动所得占 GDP 比重持续走低，才导致中国制造具有极强的全球竞争力，才导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才促成了中国

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分配天平长期向资本和政府倾斜是高增长的主要推手。因此，只要外需不出现全面萎缩，只要国内经济不出现重大问题，只要资本仍在追逐利润，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内就不可能有较大下降。可是这列“高速快车”的浙江部分却相对减速，乃至出现了“十年下滑，一朝垫底”局面，无论如何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浙江经济的相对低增长确实是转型中的问题，但增长位次“垫底”并不意味着转型加快，事实是省内经济转型升级依然缓慢。浙江大企业转型正在深入展开，但主要是通过加大在省外投资来实现的，对省内转型升级促进较少。2004—2010年，浙江纺织服装业比重下降仅稍快于全国，机械装备业比重提高仅与全国持平，其他主要行业的比重亦缺少积极变化。浙江第三产业增速出现下降迹象，2001—2010年，浙江第三产业增速均在11%以上，其中6个年头为13%以上，但201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速为10.3%，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可见服务业增长亦将由于全省增长减速而下降。另外，居民和企业收入增长也已持续放慢。

所谓浙江模式只是一个简约的说法，其口语化同义词，就是“浙江的那些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诸如草根创业、民营企业、块状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几乎成了浙江的代名词。当前面对浙江经济新情况、新问题，“浙江的那些做法”显然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浙江模式的式微

浙江模式是浙江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产物。浙江模式的动力结构是农业文明传承与基层和群众摆脱贫穷愿望的结合，产权结构以民有民营为主，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当前这三方面都有若干问题。

浙江经济的相对低增长，直接因素是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1980—2004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2%，比全国高4.4个百分点；2004—2010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3.4%，比全国低12.8个百分点。2011年上半年，浙江投资增长虽然大致与全

国持平，但如剔除房地产投资，仍比全国低 5 个多百分点。

关于浙江投资低增长有两大直接原因。一是大企业大量向外投资，据我们 2010 年估算，按当前投资规模，浙江上市公司如对省内投资增长 2 个百分点，对省外投资则增长 3 个百分点，详见本书第六章《浙江上市公司对省外投资研究》；二是中小企业增长放缓，对此后文将深入分析。大企业向外大量投资的原因，是由于浙江大企业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当前特别不适应省内环境资源制约，同时产业结构长期路径依赖导致短期内原地转型难度较大，于是干脆向外继续去发展原有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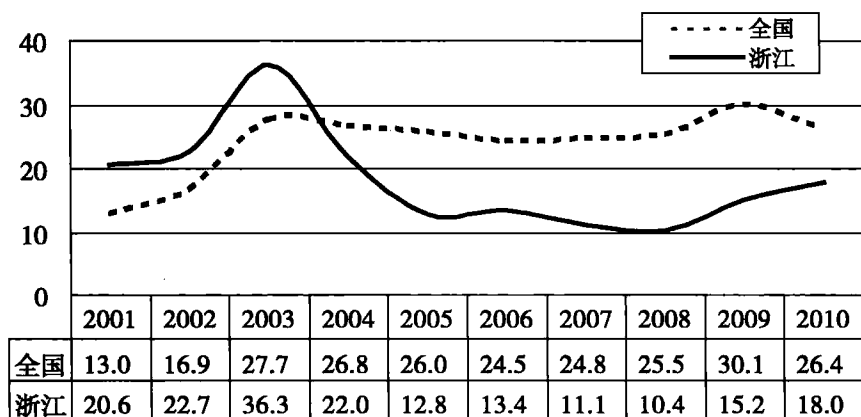


图 2 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全国比较（比上年增长%）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

制造业投资增长成为“洼地”。2004—2009 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 13.0%，比全省平均低 0.5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 19.0 个百分点。2011 年上半年，浙江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亦比全国低 10.6 个百分点。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速是一种全面的、缺少结构差别的下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缺少转型升级的下降。全国有资源优势投资增长较快的领域，浙江当然增长较慢；全国投资增长红火的其他领域，浙江同样较慢；全国投资增长慢的领域，浙江更慢。2004—2009 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最快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但年均增长仅 27.2%，比全国低 9.7 个百分点；全国投资增长较慢的纺织业，浙江年均增长仅 4.9%，比全国低 13.4 个百分点。

工业竞争优势下降。2004—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均在全国第19位以下。就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工业增速在全国的位次，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无差别的下滑。2005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的10.3%，2010年下降到7.5%，降低了2.8个百分点。2005—2010年，浙江制造业30个行业只有印刷行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上升，其余均为下降。浙江具有优势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降低4.0个百分点和7.3个百分点；浙江不具有优势的电子和装备行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亦降低0.9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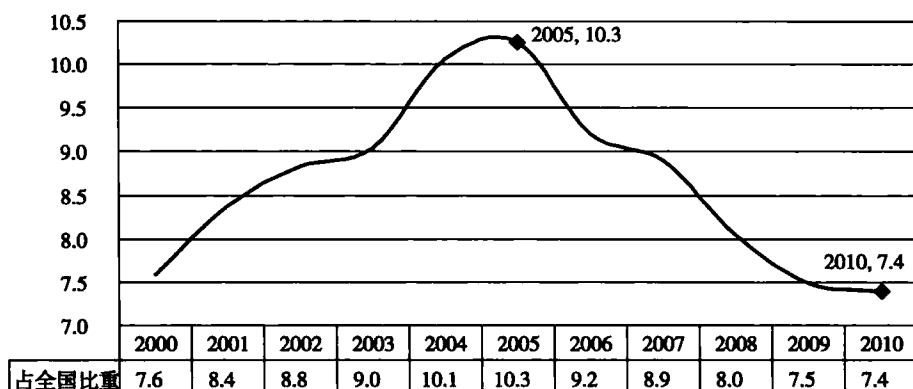


图3 浙江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

城乡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曾是浙江引以为豪的指标，现在情况也不容乐观。2004—2010年，浙江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低1.1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所谓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全国最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城镇人均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而农村低于全国平均的幅度相对低一些所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8—2004年为年均增长32.9%，列全国第14位；2004—2009年为17.5%，列全国第25位，比前一个时期下降11位。另外2010年1—11月份，浙江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2.2%，仅列全国第23位。这些情况都表明，随着经济增速的相对下降，居民和企业收入增速在全国位次亦出现下滑。可见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也难有相应的效益增长。

表 1 浙江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全国比较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上年增长%)			农村人均纯收入 (比上年增长%)		
	全国	浙江	浙江高于 全国	全国	浙江	浙江高于 全国
1991	7.2	5.0	-2.2	2.0	5.0	3.0
1992	9.7	11.9	2.2	5.9	11.9	6.0
1993	9.5	14.0	4.5	3.2	14.0	10.8
1994	8.5	12.0	3.5	5.0	12.0	7.0
1995	4.9	5.0	0.1	5.3	5.0	-0.3
1996	3.9	1.8	-2.1	9.0	1.8	-7.2
1997	3.4	1.6	-1.8	4.6	1.6	-3.0
1998	5.8	5.3	-0.5	4.3	5.3	1.0
1999	9.3	8.0	-1.3	3.8	8.0	4.2
2000	6.4	9.1	2.7	2.1	9.1	7.0
2001	8.5	13.3	4.8	4.2	13.3	9.1
2002	13.4	13.4	0.0	4.8	13.4	8.6
2003	9.0	11.9	2.9	4.3	11.9	7.6
2004	7.7	7.4	-0.3	6.8	7.4	0.6
2005	9.6	10.4	0.8	6.2	10.4	4.2
2006	10.4	10.9	0.5	7.4	10.9	3.5
2007	12.2	8.4	-3.8	9.5	8.4	-1.1
2008	8.4	5.4	-3.0	8.0	5.4	-2.6
2009	9.8	9.7	-0.1	8.5	9.7	1.2
2010	7.8	7.0	-0.8	10.9	7.0	-3.9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

浙江经济发展冲劲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客观因素所致，但从浙江增速的相对下降成为沿海省份之最当中也可以看出，省内经济模式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环境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草根创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大量利用境外成熟技术和人口红利，是浙江模式最为重要的特征，目前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颓势。

一是省内增长动力弱化。浙江高速增长肇始于民间温饱诉求，温州“率先贫穷”推动率先改革；浙江创业主体众多，但总体素质相对较

低，尤其是长期粗放增长导致发展空间有限，这就在经济增长始端即埋下了动力衰减的原因。未富先骄，未富先奢；大而不强，大而出走；中小企业“去实业化”，大企业“去浙江化”，进一步滞缓了省内经济增长。

二是产业结构路径依赖。浙江人精明肯干，形成了一种“豆芽菜”经济格局。豆芽菜生长迅速，也有一点韧性，但缺少根基，长到一定高度就难以为继，典型者即是浙江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长期以低层次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至今仍为全国较高。

三是发展环境变化。浙江经济长期是一种“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结合的数量型增长。乡土企业家大量采用境外成熟技术装备，大量以生存工资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次产品。然而，随着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资源环境制约的严峻，且产权保护缺少良好预期，也就逐渐宣告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式微。

“浙江人经济”风起云涌，或许是浙江模式的一种嬗变。然而浙江模式如果不能较快地增进省内居民福利，实际就弱化了浙江模式原本最重要的“民富”特征；“浙江人经济”如果不能有力地促进省内经济，与浙江也就是渐行渐远了。

我们所说的浙江模式式微，是指浙江原有的那些做法，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新形势。浙江模式如果不抛弃原先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不加快引入新的积极因素，就难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活力。当前关键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破除故步自封和骄傲自满，努力重振浙江雄风。

三、浙江精神的式微

对于浙江精神的起源，或许可以有三点归纳。一是长时间农业劳动铸就的勤劳习俗，二是集约和多样化农业导致的精明习俗，三是气候与历史进步造就的积极的人生观。当然还应该有其他因素，但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就拿第三个因素来说。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致在唐朝就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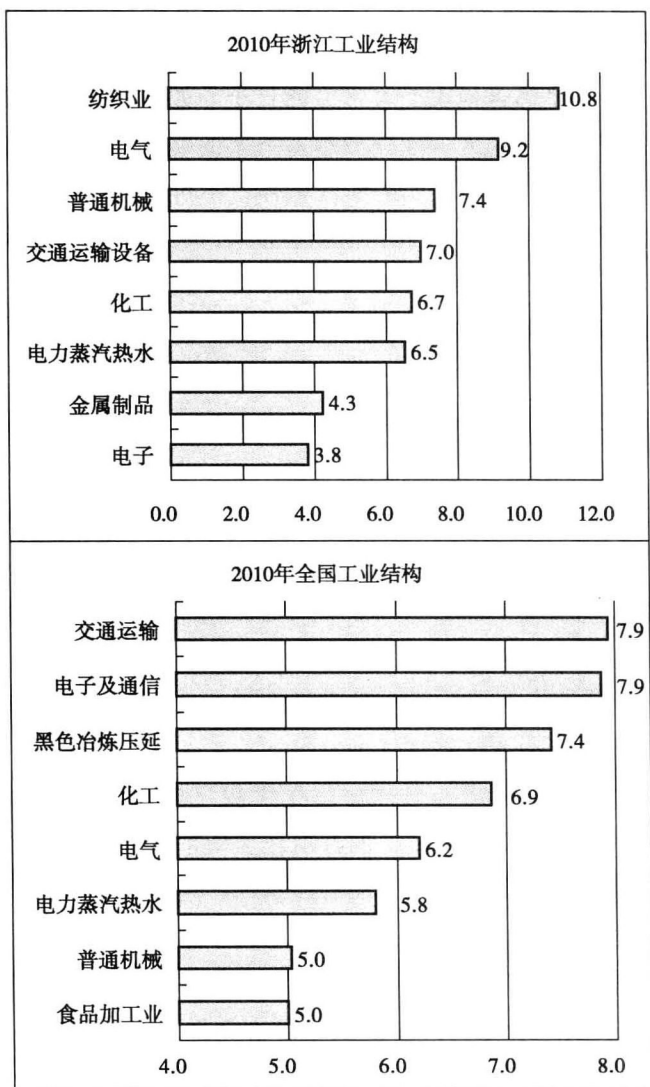


图4 2010年浙江工业结构与全国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

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鲜有较大进步，人们的心死了，又贫又困；浙江的贫穷主要是新近两三代人的故事，人们的心没死，贫而不困。因此对于浙江人来说，贫穷或许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比较典型的如鲁迅笔下的阿Q，内心总是有着一一种莫名的自尊，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种自尊形成很强的心理支撑，促使他们总是试图改变周围世界，而不是默默顺应；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着创业机会，而不是痛苦地忍受着贫穷的日子。如阿 Q 就向往着小尼姑的爱情，向往着和革命党人一起去分赵太爷家的财产。

直接脱胎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浙江精神，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大的内在不足和时代局限。一是知识素养薄弱，浙江 1980 年全部在校学生占人口比重仅为 17.3%，大致仅相当于日本 20 世纪 30 年代水平；浙江 2010 年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9.3%，比日本 2000 年低 11.6 个百分点。二是法理精神薄弱，近几年对于浙江两位著名企业家行为的争议，或许也反映了这一点。以上二者中国其他省区应该更甚，但浙江人均 GDP 比他们高出一大截，理应更强一些，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三是创业动力源于摆脱贫穷的直接激励，这与 17 世纪英格兰人出于追求宗教自由目的而在北美大陆开拓具有显著差别，小富即安、企业难以做大做强、长期陶醉于低层次产业等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当前省内经济增长障碍加大时，素质性和体制性弱点开始明显制约浙江企业创业创新。就当下而言，浙江的社会气质和社会情绪，日益呈现以下三个明显问题，正在严重影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锐气日钝，奢靡日盛。浙江市场化进程已明显放慢，2009 年浙江市场化指数虽然仍居全国首位，但首次较上年下降，领先于其他省区的优势正在大幅弱化。与此同时，政府建筑物日渐豪华，公务消费日渐严重，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与改革开放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民间人士一掷千金，夜输千万元，以至于世界博彩业把浙江作为重点服务地区。就在 2009 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疯狂肆虐的时候，浙江企业家仍在上海车展狂购豪华名车。

稳健日长，创新日短。浙江 30 年改革的实质，就一定意义而言，是回归习俗，回归传统。农村回到以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态，城市重塑厂长经理权威，全省经济回归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发展战略回归轻纺优先。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随着家大业大，浙江人的稳健保守再次成为社会基调，开拓创新依然稀缺。如浙江专利授权数近三年合计虽然高居全国第二位，但发明授权数仅列全国第五位，尤其是发明授权数仅占全省专利授权数的 5.9%，为全国最低。当前面对省内资

源环境和体制制约的日益严峻，大企业选择了向外走，中小企业选择了收缩，“去浙江化”和“去实业化”成为时尚。

精明日增，高明日弱。浙江企业家向来“不见兔子不撒鹰”，然而精明做到极致，便是高明退化。2010年浙江电子行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7%，专用设备行业产值仅占全国的6.4%，分别比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低2.8和1.1个百分点，从一个角度表明浙江企业家的高明应该是有所欠缺的。政府经营城市的水平越来越高，然而商贸为门面房所累，住房为房价和租金所累，城市居大不易。1990—2000年，杭州GDP年均增速比苏州高1.2个百分点，2000—2010年则比苏州低1.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较高曾是杭州的骄傲，但苏州城镇人均收入正在逼近杭州，农村人均收入已高于杭州。与此同时，杭州房价长期比苏州高两倍多。

曾令浙江朝野无比自豪的浙江精神，如今却日渐蜕化，确实值得令人深思。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今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滞后非常不利于浙江精神转型提升，板子并不能完全打在浙江人身上；另一方面是省内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和行为方式，使得浙江在物质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精神生产领域发展却大大滞后，甚至出现了个别政策退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如果当年仅仅依靠敢闯敢冒精神，就能打出一片崭新天地，如今虽然还需要敢闯敢冒，但却更需要精细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坚实支撑；如果当年还能依靠诸如“擦边球”之类的小聪明甚至是旁门左道就快速致富，如今却需要大智慧和科学法理精神。这些既需要全国统一的体制机制创新，也需要浙江自身的努力。如果走不出传统小农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束缚，如果不能依靠对于更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如果不能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难以重铸浙江的商业竞争新优势和区域发展新辉煌。

四、浙江中小企业的式微

仔细解读2010年浙江经济的一些数字，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可以得出浙江规模以下工业负增长6.5%的结论，而2010年，浙江GDP增速仅列全国倒数第5位。除非

统计局另有规则，除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能如此理解，否则就可以得出规模以下企业拖了浙江经济后腿的结论。

对此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小企业变身为规模以上企业，导致同比增长减少，可喜可贺；另一种解读是小企业创办减少及现有小企业发展较慢，值得警觉。分析表明，前一种解读确实存在，后一种解读或是主因。

根据经济普查数据，2004—2008年，浙江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主要增长指标，大致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期间，全国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数年均增长7.7%，浙江仅为2.9%；全国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15.4%，浙江仅增长13.0%；全国规模以下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5.5%，浙江增长15.9%，仅比全国平均高0.4个百分点，浙江中小企业长期发展不容乐观。

浙江草根创业已不再全国领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9年，浙江个体户数年均增长3.4%，只及全国平均增速的一半，列全国倒数第7。同期，浙江私营企业户数年均增长11.2%，应该是一个非常快的数据，但仍于低于全国4.1个百分点，列全国倒数第3。另据工商部门数据，2010年和2009年相比，浙江个体工商户增长6.4%，比全国平均低1.6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数增长11.7%，比全国低2.5个百分点。

或许浙江经济太强，不再需要中小企业给力？回答是否定的。日本政府把雇用99人以下的企业作为小企业统计，1966年日本小企业420.8万家，1981年625.1万家，15年增加了204.3万家。2006年，日本从业人员99人以下的民营企业，户数占全部民营企业的98.9%，从业人员占全部民营企业的73.7%，小企业仍是日本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或许从浙江自身看，中小企业增长仍较快，居全国位次较低不应是一个问题？回答更是否定的。浙江处于竞争性体系之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若干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长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浙江就会落后，就不可能走在前列，就真的会拖了全国的后腿。而且，经济转型在当前技术快速进步、工艺技术和装备短期内就有可能落后的全球化格局下，多半得通过增量调整推进，如果增长缓慢，转型亦不可能